

# 論共產主義道德 的幾個問題

О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АХ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РАЛИ

沙里亞著 高晶齋譯

正風出版社印行

# 論共產主義道德 的幾個問題

沙里亞著  
高晶齋譯

正風出版社印行

П. А. ШАРИЯ  
О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АХ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РАЛ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論共產主義道德的幾個問題

原作者 沙里亞 出版者 正風出版社  
上海漁池路100號

譯者 高晶齋 出版期 1952年3月滬初版  
1952年10月滬三版

有版權 ★ 禁翻印

## 序 言

序

共產主義道德問題，在我國由社會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內，特別具有現實性。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我們說：非但新的、共產主義經濟的建設，就是人的共產主義新意識的形成，都不是自流地進行的、都不是在自發的過程中進行的，而是經過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多方面的和合乎目的的教育工作，才能實現的。羣衆的社會主義的覺悟，是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在生產關係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在人們在布爾什維克黨推進和領導下為建設新社會從事的實際鬥爭過程中，才能養成的。社會主義的覺悟，反過來，又是加速共產主義建設過程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從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基礎和上層建築理論的觀點看來，是十分明白的。斯大林同志繼續發展了這個理論，特別強調指出上層建築的積極作用，重新闡明上層建築對於基礎反作用的問題，並揭示出這種影響的具體內容。

『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這並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只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都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相反地，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能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地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根除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sup>(1)</sup>。

至於我們的黨給與勞動者思想教育如何的巨大意義，這從近幾年來由於偉大的斯大林建議而

經聯共（布）中央通過的關於思想問題的決議中，獲得了證明；這些決議在蘇維埃社會主義文化的繼續提高方面、在科學藝術和文學的發展方面，都起着極重要的作用。

經聯共（布）中央的提議，對於哲學、生物學、語言學、生理學和藥學等科學的討論，提高到全黨和全體人民的重視和參加這樣的地步，也可說明這同一事實。

斯大林同志由於親自參加語言學的討論，不但給蘇維埃語言學提供了珍貴的貢獻，並把它變成了有條不紊、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有機地結合一起的理論，而且以在人類知識各領域具有巨大意義的重要理論概括，更加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今日道德問題的真實性，是由與兩個陣營——以偉大蘇聯爲首的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與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反動和侵略陣營——的鬥爭聯繫一起的那個因素所決定的。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具有歷史意義的報告中，曾經說過：希特勒匪幫已經要失人性，淪爲兇惡的野獸。大家知道，希特勒及其伙幫，乃是國際帝國主義的走狗，他的道德本色，完全反映出他們主子的道德面貌。

由於蘇維埃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偉大的英明和天才領導下進行的英勇奮鬥，希特勒及其伙幫夢想恢復中世紀野蠻和黑暗的統治那些瘋狂計劃，遭到了可恥的失敗，此後，帝國主義強盜的道德墮落，便更一天天地加劇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命題，一個顯著的新

證明。但大戰的結果，證實了斯大林同志特別有力地非祇一次地着重指出另外一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命題——剝削者永不甘心於喪失他們自己的統治地位，決不肯和平地、自願地放棄陣地。他們由於動物自衛本能的支配，漠視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害怕要失他們的那怕是一小部分的特權和利益，就不惜準備以血腥的手段屠殺整個人類。在這裏面表現出瘋狂資本家的登峯造極的個人主義。「祇要我們安全，洪水成災，也沒有關係」——命運注定滅亡的那一小撮吸血鬼的心理，就是這樣。他們有掠奪來的無數財富，藉以從最不堅定的知識份子中間，收買狐羣狗黨的應聲蟲，而這般知識份子爲了貪圖小市民的舒適和「安定」生活，準備出賣他們全部良心、名譽和算嚴。

列寧曾經把正在崩潰的資本主義比作臭氣。今天這種臭氣，已經可怕地瀰漫開來，妨礙各國人民自由和健康的呼吸。可是各國人民所幸運的，就是資本主義早已不再是世界上整個的統治體系了。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新的社會主義體系誕生並鞏固起來了。它日益壯大和加強，節節地奪取了資本主義的陣地。從這裏，從蘇維埃國家，發射出照耀全世界人類自由和幸福的偉大曙光。從這裏，從蘇維埃國家，產生整個被剝削和被壓迫的人類解放的希望。

在帝國主義者陣營裏，正拼命尋求破壞物質和精神價值以及屠殺人類的最有效的凶器，例如氯彈之類，想把現代科學和技術的一切成就，都用來達到這種罪行的目的。在我們勝利了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國家裏，世界上最先進科學的整個強大的機構，都是根據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意志，用到崇高目的上面的——使人類的勞動更加輕快；爲保證物質和文化福利的豐富、爲發

展勞動者的創造力、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對於全世界勞動者來說，蘇聯乃是如何管理國家、如何在沒有剝削者和寄生蟲的情況下來從事建設、發展、繁榮的一個偉大生動的榜樣；蘇聯的存在，同時也是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宣告死刑，而資本主義體系，如不靠廣大人民羣衆日益貧窮，如不靠陸續毀滅人類勞動生產的價值和屠殺人民，是不能存在的。剝削者的財富雖是靠人民的勞動獲致的，但由於這個體系的總危機日益加劇，已不能保證人民的勞動和生活了。總而言之，在蘇聯，真正人類歷史，好像光芒萬丈的旭日東升，而資本主義體系有如慘淡的殘陽，徐徐西沉，必然地走向完全的黑暗，祇等待着資本主義國家內勞動者和一切進步份子，依照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工農的榜樣，推翻已經徹頭徹尾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並把早已成爲社會殘渣的剝削者和寄生蟲拋棄到歷史的污水溝裏。各國剝削者所以對蘇聯的瘋狂憎恨，就是這個緣故。而人類中一切真誠的、真正進步的人，所以對蘇聯懷抱着熱愛，因爲蘇聯正在爲着各國人民的和平與安全，爲着各國人民的主權，爲着他們不受華爾街無恥的干涉（美國假惺惺地妄稱這種干涉是對歐亞各國的「援助」）而自決其命運的權利等等，從事堅毅不屈的鬥爭，他們認爲聲援蘇聯這種鬥爭，乃是自己的道德責任。

馬克思說道：人在影響和改變外在自然界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的本性。這個深刻的唯物論命題，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獲得了光輝的證明。蘇維埃人在偉大的斯大林賢明領導下，根據偉大的列寧、斯大林綱領，完成了舊剝削社會制度的革命改造，把舊社會改造爲社會主義的新制度，此後，依照天才的斯大林計劃，改造自然界本身，同時也改造了自己，改變了自己

的道德面貌。蘇維埃人們，是人類歷史上完全嶄新的人們，是受過列寧、斯大林式鍛鍊的人們，克服了私有財產利己主義的狹隘眼界，認爲社會、國家利益高於一切，使個人利益服從於社會利益；他們是不斷地發揮創造性、主動性、不停地前進，在前進途中不畏困難，在達成預定目的上頑強不屈、對於友誼忠守不渝、對於人民敵人毫不妥協的人們，他們是具有原則性和思想性、在執行自己對祖國的義務和責任上具有高度自覺性的人們。他們道德面貌形成的途徑，是豐富而複雜的。指出這條道路，就等於敘述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不倦的教育工作的歷史，就等於敘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各主要階段的歷史。

這本書並沒有提出，也不能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本書是根據一九四八年在蘇聯和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聯席會議上的報告寫成的。

作者在本書中儘量扼要地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道德理論的基礎，並指出反映蘇維埃人道德面貌的共產主義道德幾個基本原理與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世界觀——辯證唯物論——的不可分離的聯系。當然，在這種場合下，不能把主要注意力用到列舉新的蘇維埃道德的主要特徵，更不能多用蘇維埃人們生活中的實際材料去說明這些特徵，而祇是指出作爲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之一的道德基礎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在其長成和發展過程中的有機聯系。同時，主要的是指出：新的共產主義道德，不是從自身的基礎機械地自發地產生出來的，而是由於我們黨的積極鬥爭和教育工作，才能形成的。從別方面說，必須指出現代資產階級的道德和蘇維埃人的道德全幅對照的圖

景，更確切地說，必須把現代「文明的」「吃人野獸」的全部非道德論指出來，但照這本書的性質說，就是這樣做，也不可能多用實際的說明材料，因此，主要的注意，是指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徹頭徹尾的道德墮落，與腐朽了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現狀和遠景的關係。

對於過去和現在資產階級的道德理論的批判，讓作者看來，乃是一個獨立的題目，在這裏祇有在本書的篇幅和性質許可範圍內的，更確切地說，在本書要求的限度內，從事這種批評。本書的目的可以用以下的基本論綱表示出來：指出一切資產階級的道德觀是非科學的，是帶着明的或暗的辯護性質和反動性質的，而資產階級的現實，不停地引到日益加劇的道德敗壞——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道德理論，則是唯一科學的，而共產主義建設的實踐，引導人日益上升的道德面貌提高起來，引導他的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達到美滿和真正和諧的境地。

作者在本書中試圖單獨地提出幾個道德問題，並根據馬、恩、列、斯的學說，來解決這些問題。當然，在本書中可能出現一些需要繼續加以確證的論點，但是這些問題的提出，可以促使其他同志更加充分地研究它們。斯大林同志說「誰都承認，如果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辯，沒有自由的批評，任何科學都是不可能發展，不可能進步的」<sup>(2)</sup>我們思想戰線上每一工作者，祇有循着這個賢明指示不倦地去努力，才能對於蘇維埃科學提供他力能勝任的微薄貢獻。

(1)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第七頁。

(2) 同上，第三十一頁。

# 目錄

## 序言

日

一 論馬克思以前的道德觀 ······	二十一
二 論倫理學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中的地位 ······	二十二
三 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德觀 ······	二十三
四 論共產主義道德形成的途徑 ······	二四
五 論蘇維埃人道德面貌的幾個特徵 ······	二五
六 論道德因素乃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 ······	二六
七 論道德在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中的意義 ······	二七
八 對現代資產階級幾個道德觀的批判 ······	二八
九 兩個世界——兩個體系 ······	二九

1

## 第一章 論馬克思以前的道德觀

從方法論方面說，大量的、從外表看來彼此顯著不同的那些道德理論，可以歸結為幾個主要哲學派別及其變種。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那本早年著作中對於這些主要哲學派別及其變種做了一個言簡意賅的描述。

無論是唯物論者還是唯心論者，都把道德看成意識的屬性或形態，但唯心論者既然認為意識對存在說是第一性的，而且是離存在而獨立的；那末他們的道德原則和規範，也同樣認為是離人的社會存在而獨立的，是由「上帝意旨」中產生出來的。唯心論各種變種中存在主觀的個人主義的道德觀（普洛塔哥拉、費希特、叔本華等人）和客觀的個人主義道德觀（柏拉圖、萊比尼茲、黑格爾等人）。

康德的唯心道德觀徘徊於客觀唯心論與主觀唯心論之間，因為依照康德的見解，形式的道德原則，是根於主體自身，植基於意識內，但它們的實現則與人類存在的「經驗的」條件聯系一起。康德的「生存」和「道德義務」形而上學的對立，就是由此而生。

唯物論各派就不是這樣了。馬克思以前的偉大唯物論者，比起庸俗地把物質與思惟混為一談

的那種看法高出一等（庸俗唯物論者主張道德是機械地從人的生理本性中產生出來的，正如他們認爲意識是物質的機械的產物一樣），但說到道德問題，就如對一切社會現象的議論一樣，既然認爲人的思惟意識不是社會發展的歷史產物，而好像是「一成不變的固定的什麼東西」，所以歸根到底仍然逃不出唯心論者的窠臼。祇有辯證唯物論才能根據對思惟與存在的問題、思惟本性的問題，予以正確的科學的解決，創造出真正科學的道德理論。

列寧關於哲學的黨性所說的話，尤能適用於道德問題，因爲相互鬥爭的階級利益，在道德上面更直接地表現出來。在無產階級專政以前，任何階級的統治，既是少數人對於壓倒的大多數人的統治，那末各統治階級除去採用直接強制和暴力的手段外，還需要欺騙羣衆意識的一套把戲。資產階級的專政，照斯大林同志所下的定義說，乃是「祕密的、隱藏的，幕後的、爲了欺騙大衆需要穿上一層美麗外衣的一種專政」<sup>①</sup>。自從僧侶等級形成以來，意識形態就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因素，自從社會分裂成階級後，它在統治的榨取的階級手中，便已具有精神壓迫工具的這種强大作用了。在意識形態變爲相對的獨立力量以前，它多少還能決定人類行爲。因此，宗教和道德一類的意識形態在階級社會以前的起源與它們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的階級功用，是不可混爲一談的。

無論宗教和道德，在自己的發展中都要經過許多階段，有時還完全相互結合一起（把道德吸進宗教範圍以內），有時彼此顯著地分離開來，但在剝削者社會裏，永未喪失某種相互的依存關係

係。

說到社會發展的初期，我們應當注意：這一時期內的社會聯繫與關係發展和複雜的程度，還未達到提出個人和社會的相互關係的問題的地步，但如我們下面就要說到的那樣，道德的根源，正是在於這種相互關係中。

這當然不是說，在所說的這個時期中，社會關係根本不存在，而祇是說它們還未越出家族或氏族關係的範圍，這種關係，是由自然形成而具有絕對法律效力和僅由於習慣而遵行不悖的那些習俗和傳統，加以調節的。

隨着社會分裂成階級，促成國家的產生，以及因此引起的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之間某種限度的對立，就在完全新的條件下，提出了社會裏人的相互關係問題。國家制度和法律，就代替了習俗和傳統在調節這些相互關係上的地位，國家制度和法律，已有「從社會中產生出來，但高踞社會之上逐漸與它隔遠的」<sup>②</sup>那種有組織的力量——國家——為其後盾。國家的起源，是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及伴隨而生的在生產工具和資料的私有制基礎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分裂的結果，這點首次由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揭示出來，並加以科學的證明了。顯然，在這些新的條件下，如要使社會發生功能，僅憑與氏族首長或部落酋長那樣大的傳統權威控制的習俗、道德、以及習慣了的傳統聯繫一起的人們內部的激動，已不夠用了。發生了外部的法律強制後，個人與社會國家利益的調和、結合或協調的問題，就因此而生了。

從古代希臘的例子，不難追溯到在社會分裂成階級及其矛盾加深的基礎上的國家性發展的過程中道德問題的產生。如說早年希臘哲學家——通常所謂「蘇格拉底以前的哲人」——對於道德這個社會問題，縱使賦予它們本體論的一般意義（尤其是阿拿克西曼德和恩培多克），但還未把这个問題顯明地提出來，那末自沙非思特派和蘇格拉底以來，作為社會問題看的道德問題，在哲學思惟中，就佔了中心的地位。顯然，沙非思特派的啟蒙，也是以社會問題為中心，甚至把這種啟蒙稱為公民善行的「科學與藝術」。蘇格拉底既是奴隸主民主制的敵人和貴族階級的擁護者，從本質上看，與其說他是反駁沙非思特派，還不如說是繼續發展他們的原理。他主張知識乃是最高的「善」，照他的意思，知識的主要目的，就是人們的理想企望與他們實際活動原則間的調和。在蘇格拉底的怪論中——懂得「善」為何物的任何人，都不會做出惡事來——實質上提出了剝削者社會所不能解決的個人與社會理想「調和」的問題。非理性主義乃是剝削制度不可缺少的因素；這種制度既建立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那末便必不可免地會引起許多個人企望的相互衝突，其結果如何，既不能預見，更不能預定。

剝削階級的利益，需要充作它階級壓迫工具的國具有絕對權威，而且國家本身，也是剝削者以反對勞動大眾個人利益的集體人格而出現的。一切唯心論者，想把國家權力從「神的」起源下「挽救」出來，並且主張國家權力乃是最高的「善」那種企圖，就是由此而生。柏拉圖就是循這個方向，「發展了」蘇格拉底的倫理原則，在宇宙最高的理想基礎的概念裏，把最高的「善」

和最高的「美」統一起來了。我們現在所感到興趣的，不是柏拉圖在從這個神祕的基礎上試圖「引伸」出調節社會相互關係的具體的倫理原則時，他不可避免地深陷在那些矛盾裏的這樣問題。

古代偉大的唯物論者德謨克里特，與奴隸主貴族的思想家柏拉圖相反，他試圖根據自然規律、根據自己原子理論建立起倫理學來；但在這裏不能不說一句：從他的機械唯物論中必不可免地要發生理性原則和經驗原則間的脫節（在他認識論中也有這樣情形）。這種二元論，到了亞里士多德手裏便更突出。大家知道，他批判柏拉圖哲學時，也不徹底，他試圖把唯物論與唯心論調和起來。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的形而上學的倫理觀相反，他想把倫理學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面。但正如列寧天才般所指明的那樣，他在一般和特殊的辯證法中，陷於迷亂，他在倫理學領域內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相互關係這個問題上，也同樣迷亂不清。他的重要倫理原則——幸福主義，不但是亞里士多德各種評論者，就是他的信徒有的也解釋成利己主義和快樂主義，有的又解釋成利他主義——的不明確性，就是由此而生。一方面他承認柏拉圖所說的「最高的善」，主張循着這個原則「自求完善」，另一方面，他瞭解實際社會問題的意義，努力把個人的傾向和意圖，與對國家法律的服從調和起來，因此也就努力把倫理學與立法調和起來。歸終到底，亞里士多德仍然脫離不了他經驗的「折衷」公式，這個公式是與他的藝術尺度那個著名原則相符合的。由此可見，他對調和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這個問題，沒有能力解決，實際上，在剝削者社會的條件下，這是根本不能解決的問題，祇有階級對立社會自身的發展能夠暴露它的死亡已歸不可避免的時候。

才好像在理論上是被解決了。後來各種剝削者意識形態中想把科學與實際的道德目的在原則上劃清界限的那種特殊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在亞里士多德身上已露端倪了。

古代一切倫理學體系中最顯著的，是繼承德模克里特的著名唯物論者伊壁鳩魯的體系。他試圖根據他的認識論建立感覺論的倫理學。他的學說被唯物論的敵人譏諷地加以曲解，把他的學說看成與亞里斯梯普主觀的快樂主義一樣的東西。雖然伊壁鳩魯在他自己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基礎上，不能建立科學的倫理觀，但他的倫理學說是古代哲學在這方面所提出的一切學說中最高的一个。他不但堅決地從倫理學範圍內驅出「神的」因素，而且驅除了宿命、命運等概念。他把作為自己倫理觀基礎的快樂原則，不是從狹義的快樂主義的意義上去瞭解，而是從身心的恬靜的意義上去瞭解。但他的唯物論的思辨的性質，也就在這點上表現出來了。伊壁鳩魯主義的「實踐」，表現在與積極的社會政治生活和鬥爭的脫節，表現在慈善的哲學「公社」的建立上面，這些公社是從自身的內心和環境安靜得到安慰的。伊壁鳩魯的倫理學從這個論點裏面就反映出奴隸主制度的開始崩潰，這點在斯多葛派的道德學說中得到最充份的表現，斯多葛派的道德原則完全與「現世」利益脫離，成為基督教禁慾主義的先導了。

由此看來，無論在一般的哲學中，還是單在倫理學範圍內，反映奴隸主意識形態的希臘思想家已經提出了一些極重要的問題，但無論他們無論後來剝削階級的思想家，都不能予以科學的解決。

代希臘人羅馬人異教而興的基督教，如恩格斯光輝指證的那樣，是走向崩潰的奴隸主制度合乎規律的產物。基督教，最初是以被壓迫者「福音」出現的，但逐漸就去適應剝削階級的利益，歸根結蒂變成了「人民的麻醉劑」。因為羣衆遭受蹂躪和愚昧無知（我們在這裏涉及的，不是其他更本質的宗教基礎——社會基礎——而祇是說在剝削社會中大眾所受的壓迫）②統治階級思想家便能把他們的目光從現世的現實問題轉移到天堂的、理想的境界。正是因此，基督教也和其他任何受屈辱受壓迫的奴隸的靈魂皈依的宗教一樣，終能掌握起道德的功能來。這樣就大大地削弱了被剝削者對剝削者的憎恨，把大部分的仇恨，導入不傷害剝削者的宗教軌道裏去。早期的基督教所以引起被壓迫大眾傾心的力量，主要是在於它直接地搭擊現存的社會上不公正的事，因此便帶上了道德面具。在早期基督教內「什麼是真理」的問題與「什麼是幸福」這個問題結合一起。如果說希臘人和羅馬人的異教上帝是體現僅僅更為有力的一切現世人類慾望，那末基督教上帝，就不但描寫成「全能的」，而是描寫成「博愛的」了。

基督教的勝利，是隨着它與國家的統治意識形態合流才能實現的。這種合流的過程，是與奴隸制度的崩潰和封建制度的產生相符合的，所以「正教」形式下的基督教，是最適合於具有多層等級的封建主義。基督教思想家對於「什麼是幸福？」這個問題答復說：地上沒有幸福，祇有天堂才有幸福。從這裏面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現世生活的意義，祇在於準備享受天堂的幸福。現世貧苦的人，祇要屈辱地安分守己，來世就變成富翁；現世受委屈的人，到了天堂就要獲得權力。